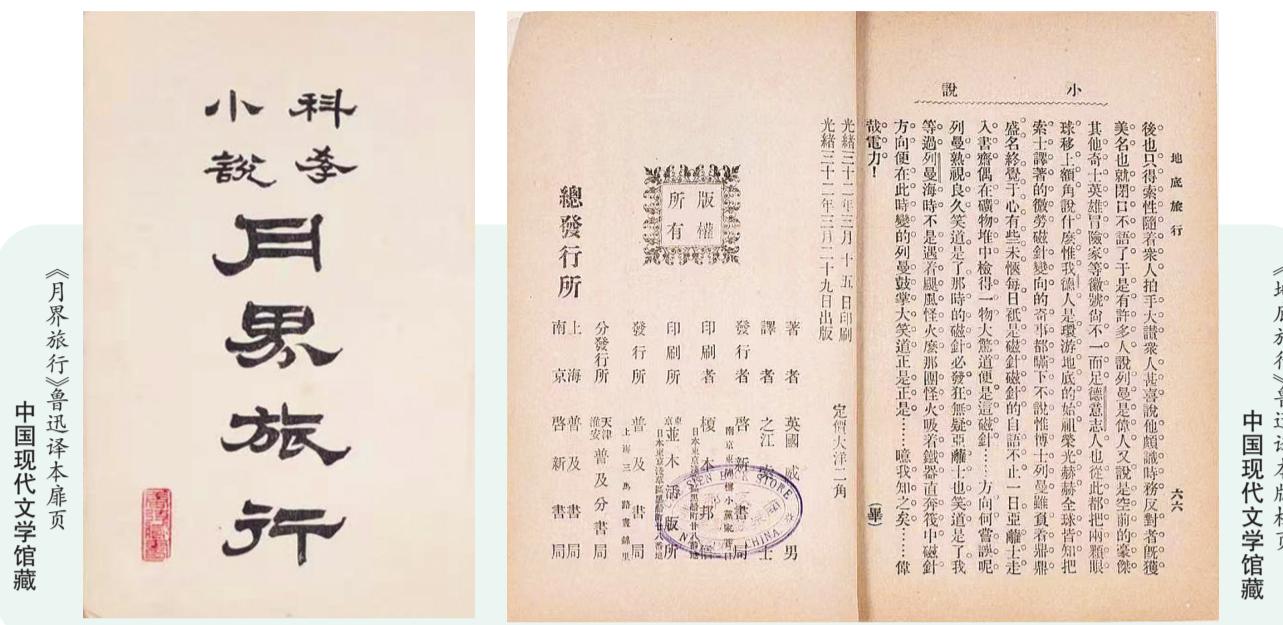




在科学与文学之间

——关于鲁迅早期译作《月界旅行》与《地底旅行》

□ 崔 琦



翻译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，他有一半作品是外国文学的介绍和学术性著述，其余一半是创作。有学者认为“鲁迅首先是翻译家，其次才是作家”。他带着种种印记进入文学，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时已进行了十数年翻译活动，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。因此，鲁迅的译著可能是深入了解鲁迅及其创作的一把钥匙。

为什么选择科学小说？

《月界旅行》与《地底旅行》是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早期译著。1902年，21岁的鲁迅以优异成绩自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毕业，“奉奖五品顶戴”，获官派留学资格。原为学习矿学而派遣留学至日本，但就读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矿山科仅一年后，即1903年6月，这位修习“矿山科”的青年便开始在东京出版的《浙江潮》杂志上以笔名“自树”“庚辰”发表译作《斯巴达之魂》和《哀尘》。虽然刊发在“小说”栏，但实际上《斯巴达之魂》为鲁迅据日文材料编译而成，《哀尘》底本为雨果的一篇随笔，儒勒·凡尔纳的《月界旅行》、《地底旅行》等科学小说，才是鲁迅最早有意识进行翻译的小说作品。

鲁迅之所以选择凡尔纳的科学小说进行翻译，据他在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中言，是“因为向学科学，所以喜欢科学小说”。在鲁迅抵达日本的1902年，日本翻译界儒勒·凡尔纳热仍有余温，其大量作品已被译为日文，成为传播科学知识与现代性想象的媒介；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于同年创办《新小说》，发起“小说界革命”，并于首期刊出凡尔纳的《海底旅行》，希冀借助“科学小说”“政治小说”等新小说向国人传播科学知识、启发思想。身处这一文化环境，笃信科学及进化论的青年鲁迅饱受鼓舞，选择翻译科学小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。或许由于当时的日本仅对凡尔纳作品中反映的“西洋科技文明”内容感兴趣，以及日译本多由英译本而来，导致作者姓名出现好几种译法，作者国籍有美、英、法多种说法。鲁迅翻译的《月界旅行》、《地底旅行》以日译为底本，因此也存在误译情况。

因出版时间较早，鲁迅译《月界旅行》、《地底旅行》的单行本极难得到，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各收藏一本，它们为藏书家唐弢先生旧藏。2000年，唐弢夫人沈黎云遵其遗嘱，将包括这两部译作在内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，鲁迅翻译的《月界旅行》、《地底旅行》现为馆藏一级文物，由馆内藏书版权页可见，《月界旅行》原著为“美国培伦”，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（文前署明进化社译），进化社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发行。《地底旅行》著者“英国威男”，译者“之江索士”，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。“美国培伦”、“英国威男”均为鲁迅自日译底本音译而来，表面上看，鲁迅在翻译时似乎并不知道这两部作品出自同一人之手，但日本鲁迅研究者工藤贵正根

据《月界旅行》与日译《地底旅行》的渊源推论，鲁迅当时应该对这两部小说由同一人所写有所了悟。鲁迅后来给友人的信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：“威男的原名，因手头无书可查，已记不清楚，大约也许是 Jules Verne，他是法国的科学小说家，报上作英，系错误。梁任公的《新小说》中，有《海底旅行》，作者题焦士威奴，也是他。”

此外，《月界旅行》版权页显示译者非鲁迅，系鲁迅将译稿“以三十元出售，改了别人的名字”。《地底旅行》版权页显示出版时间为1906年，实则前两回已于1903年《浙江潮》10期发表，据鲁迅在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信中回忆，他不仅几乎忘记了《浙江潮》时使用的笔名，还以为这篇也许没译完。

编译与“改作”的背后

仍是在与杨霁云的通信中，鲁迅谈及此两部科学小说译著，认为《月界旅行》是编译，《地底旅行》“虽说译，其实乃是改作”。鲁迅译《月界旅行》以井上勤的日译本为底本，凡尔纳原作28回，井上勤译作亦28回，鲁迅“截长补短，得十四回”，虽篇幅仅为原文一半，但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故事脉络，基本符合编译的理念。鲁迅译《地底旅行》也确算得上为“改作”，不仅删除、合并章节，叙述视角也由主人公第一人称转换为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。鲁迅译本篇幅的大幅减少有在翻译之初便决意重用之故，其在《月界旅行》(辩言)中明确阐述了

翻译语体的使用：“初拟译以俗语，稍逸读者之思索，然纯用俗语，复嫌冗繁，因参用文言，以省篇幅。”另一方面，恐也与鲁迅的主观意图介人文本有关，普及科学知识、使民众“获一斑之智识，破遗传之迷信，改良思想，补助文明”是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首要目的，然而考察他的翻译文本，却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缝隙。

与日译底本相比，鲁迅译《月界旅行》删掉了第五、六、十一回内容，这几回主要讲述月球在宇宙中位置、火箭发射等科学知识及人们对月球的误解；鲁迅翻译的《地底旅行》更是只保留了前半部分的探险故事，关于地质学及动植物学科学知识的后半部分被全数删去。若以科普目的论，删去科学知识的部分显然不合常理，“其措辞无味，不适于我国人者，删易少许”或可解释一二，若代入鲁迅创作小说想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、关注国民性以“立人”，便容易理解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相对于凡尔纳小说中的科学知识，文本中冒险的英雄传奇故事更切合鲁迅当时的心境。

鲁迅在《月界旅行》(辩言)中认为“若培伦氏，实以其尚武之精神，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”，主张面对“造物”的压抑，要以“希望和进化”来抗争，因此他在翻译时格外赞美冒险、讴歌英雄。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实际上是“想要借助翻译科学小说来建立某种新的人格”，他高度赞扬人的主体性，着意突出科学知识使人脱离了自然的限制成为“壮士”和“英雄”，是意图通过这样的“人”的形象的描写，促使当时的中国人奋起。试看鲁迅

于《地底旅行》第九回增加了以下一段：“天地五行，共设奸谋，宁能伤我！我惟鼓我的勇，何难克天！从此照直线进行，怕他作甚！天人决战，就在此时了！”由此可见，即使在早期翻译科学小说时期，鲁迅对“人”的关注已然萌生，这或许是青年鲁迅的思想在译作中的投射。据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回忆，他们当时在弘文学院最常探讨的就是国民性和“最理想的人性”问题。鲁迅的“弃医从文”有迹可循，在翻译科学小说的1903年，他由“科学”向“文学”的转向已悄然开启。

对科学与启蒙的复杂想象

鲁迅自述“幻灯片事件”后思想产生转变，认为“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”。这种转变并不是割裂式的，过往的科学训练、新民思想、进化论等成了鲁迅思想的元素，其“科学者”与“文学者”的品格在对异质西方文化的把握中不断延伸，一同进入了鲁迅的文学世界。其后鲁迅虽很少提及科学小说，但翻译科学小说的经历或以更隐秘的方式影响了他的写作。周作人曾评价《故事新编》中的《奔月》，“这如不是把汉魏的神怪故事和现代科学精神合了起来，是做不成功的”。

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鲁迅以《狂人日记》为起点的新文学写作，与他早期科学小说的译介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。《狂人日记》中“愚昧的群众”这一主题曾在鲁迅早年关于科学小说的著述里出现苗头，“铁屋子”这一意象与西方科幻小说的“信息失落”范式有着一定的关联。然而无论鲁迅作品中有多少科幻元素的影子，在民族危亡的焦虑前，鲁迅仍选择将希望更多地投向以文学为武器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，科学小说在短暂的火热之后让步于现实主义写作，没有跟上新文学发展的步伐。鲁迅本人也似乎忘记了其早期翻译过两部科学小说，没有收进文集里，“觉得无甚可取”。但这并不代表两部译作没有价值，它们不仅是鲁迅个人思想转型的物证，更承载着当时有识之士对科学与启蒙的复杂想象。尤其是《月界旅行》(辩言)，作为中国最早系统论述科学小说即科幻小说的理论文章，鲁迅对科学小说的定义、存在的问题、优秀作品的构成要素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方面，都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观点。“比事属词，必治学理”“经以科学，纬以人情”“觥觥大谈之际，或不免微露遁词”等判断放在当下仍具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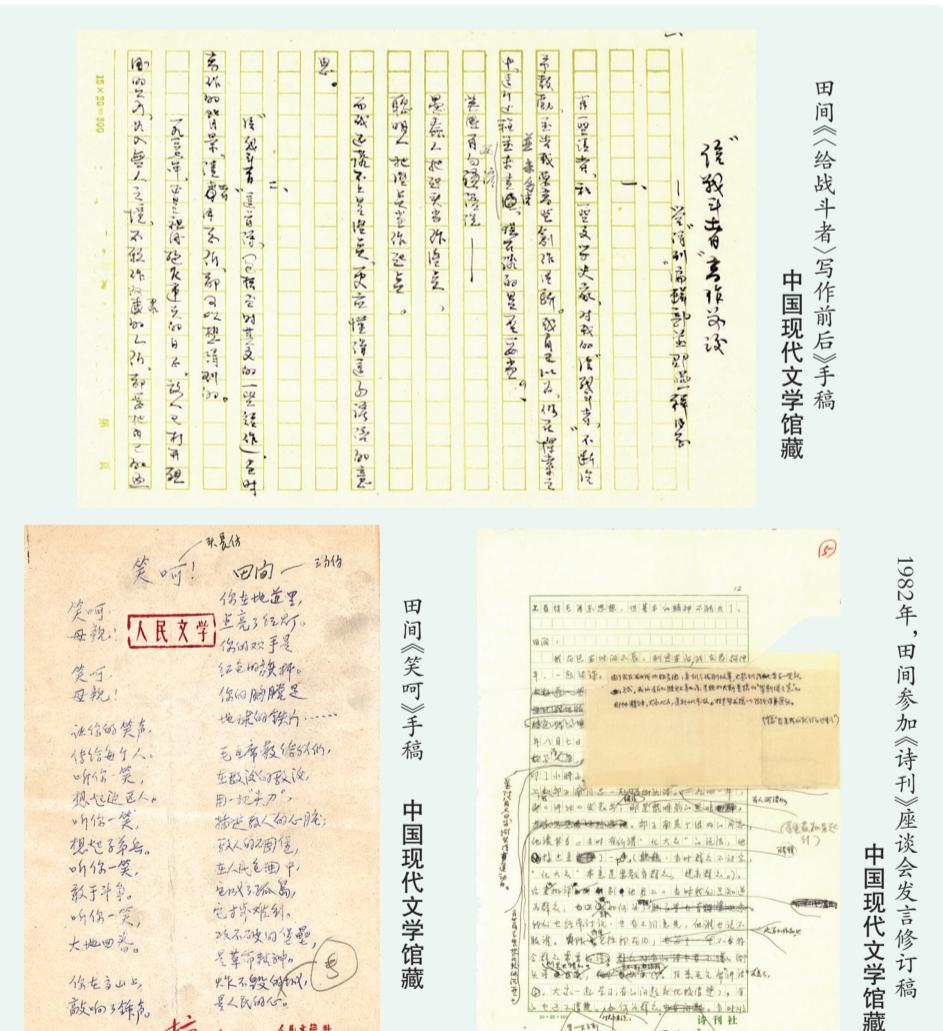
当“月界”探索已经实现，人工智能正重塑人类未来时，今天我们重读鲁迅的科学小说译作，不仅能重新发现其思想的丰富与深刻，更能借助鲁迅百年前的思考，来重新观照科学与文学在时代变革中的互动关系，思考文学与科学应形成何种新的对话。

(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共服务部助理研究员)

和人民、和生活一同前进

——从《擂鼓诗人》田间的手稿谈起

□ 袁媛



1937年冬，武昌的一间小旅馆，长江的湿冷浸透薄窗，油灯在寒风中挣扎。青年诗人伏案的脊背如一张拉满的弓，投影在斑驳的墙上。从九一八撕裂关外的铁蹄，到卢沟桥弥漫的硝烟，再到南京城头泣血的火光，同胞倒下的闷响日夜撞击着他的耳膜，那短促炽烈的诗句如箭矢般进射：

人民！人民！
高高地举起
我们
被火烤的
被暴风雨淋的
被鞭子抽打的
劳动者的双手，
斗争吧！

在祖国炮火连天的日子里，诗人田间用这首《给战斗者》，发出了雷霆般的号召，擂响了时代的战鼓。

“一九三七年下半年，我由上海来到武汉，准备北上，前赴延安。住在武昌的一家小旅馆里，一夜之间，一气写成这首长诗。”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手稿《给战斗者》写作前后》中，田间这样回忆了那个多年前的夜晚，这份回忆也带我们走进了“擂鼓诗人”田间的创作故事。

抗战的呼号者：到延安去

田间，原名童天鉴，1916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县农村，少年时曾受到古典文学和新文学作品的熏陶。1933年，田间赴上海光华大学学习，次年加入“左联”，参加《新诗歌》和《文学丛报》的编辑工作。这位热情而有觉悟的青年怀着一颗赤诚之心，积极主动地融入了革命文学的洪流，开始认真创作诗歌、研究诗歌。

在这一时期，他出版了诗集《未明集》《中国牧歌》《中国农村的故事》等，这些诗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，描绘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，中国城乡的凋敝与民众的挣扎。田间在诗歌中发出了抗争的呼喊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与关切。

从踏上诗歌创作道路起，田间就把目光投向了劳苦大众，要求以革命改变旧社会。他曾在《几次探索——我的写作简历》中谈到：“一九三四年，我是十几岁，在上海读书时，参加‘左联’，便正式学习写作。由于有党的影响，知道写作是为革命。”虽然在这一时期，田间的诗歌创作还不成熟，也缺乏一定的实践锻炼，但“人民性”与“革命性”已成为他诗歌创作中不可磨灭的基因。

1937年初，田间的诗集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“禁书”，本人也遭到了搜捕，为摆脱险境，他前往日本东京，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裴多菲、拜伦、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。这些经历深刻塑造了田间的革命诗学观，正如他在《给战斗者》写作前后》手稿中讲到的：“我之所以能写这首长诗，是因为我已经在上海参加了革命组织左联，受过一些革命的教育，读过一些革命的书籍，包括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，诗到广场去。”7月，卢沟桥的炮火撕碎了九一八以来脆弱的宁静，斗争的烽火燃烧着田间的爱国热情，他毅然返回祖国，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，奔赴民族的希望之都——延安。

北上途中，日本侵略者肆虐的暴行与焦土之上的遍野哀鸿，深深刺痛着田间的心，时代的激流与胸中的赤诚，汹涌的愤怒与喷薄的呼喊，终于凝成了武汉一夜的那首长诗——《给战斗者》。诗中，他怒斥侵略者的暴行，“吃了肉的残忍的野兽/用它的刀，嬉戏着——/人民的生命，/劳苦的/血……”他发出争取尊严与生存权的呐喊：“我们要活着，——在中

国！/我们要活着，——永远不朽！”他用最直接、最强劲的力量发出了战斗的召唤：“我们必须战斗了，/昨天是忿怒的，/是狂呼的，/是挣扎的/四万万五千万呵！”字字如鼓点，句句如号角，叩击着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心灵。田间将这首诗概括为，民族危亡之际的“召唤”——“我召唤我祖国和我自己，伴着民族的号角，一同行进。”

时代的擂鼓者：到街头去

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炽热的爱，朝着革命圣地延安，向着中国共产党，田间继续前进。

1938年初，田间和聂绀弩、艾青等人一道前往山西临汾的“民族革命大学”任教，战火使得学校被迫撤退，任教未能成行。田间在此加入了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，成了一名战地记者。

由于对小资产阶级文人气质的反感，在相识之初，丁玲对田间能否胜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持怀疑态度。丁玲在为《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瓦们》所作的序言中谈到：“我并非对‘田间’有成见，也并不是对年纪轻写诗的人有成见，是因为有过一些不知怎么就出了一点名的人，这些所谓诗人的，小说家的，就顶上那眩目的桂冠，满身也不忘记时时放射着艺术风味，实际还是‘司丹康’和‘法兰绒’西装，于是趾高气扬，徜徉

过市。”但田间用行动赢得了丁玲的信任。他虚心接受文章的修改意见，对待工作毫不骄气；他热心参与各项工作，抬道具箱子，印刷说明书和特刊，在戏院门口张罗叫卖，不喊苦不叫累。他积极地加入党的文艺事业中，高兴地穿着灰布军装充满信心地走在行列里，一直走到延安的街头去。

1938年春，田间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延安。战争使纸张短缺，受戏剧改革影响，田间想到诗也要有一些新的创作方式，正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“诗到广场去”。8月7日，田间、邵子南、柯仲平等诗人共同发起了街头诗运动，他们在《街头诗运动宣言》中高喊：“写吧，抗战的，民族的，大众的。唱吧，抗战的，民族的，大众的。我们要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这大时代中，从全国各地，展开伟大的抗战诗歌运动。而街头诗运动，我们认为，就是使诗歌服务抗战，创造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。”一时间，延安城的大街小巷贴起了、写上了一首首街头诗，诗人们用诗推动群众团结起来，走向斗争。

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，/敌人用刺刀/杀死了我们，/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：‘看，这是奴隶！’”田间的《假使我们不去打仗》是街头诗的代表，他以匕首般的锐利直刺民族危亡的核心——假使不去打仗，刺刀终结的不仅是生命，更是民族的尊严。田间曾回忆到，大约是1939年，他在一个村庄的门楼上，看见了这首诗，用很大的字写着，这让他感到了街头诗的力量，也感到了人民的鼓励。因此，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街

头诗创作，用诗歌作为武器奔赴抗日战场。他写义勇军挂着敌人头颅的枪杆，写“多点粮食，/就多点胜利”的生产运动，写破坏敌人铁道的不懈斗争。闻一多曾在《时代的鼓手》中热情地评价田间的街头诗：“只是一句句朴质，干脆，真诚的话，(多么有斤两的话！)简短而坚实的句子，就是一声声的‘鼓点’，但是响亮而沉重，打入你耳中，打在你心上。”

1938年8月，田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年底随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晋察冀边区。一路上，田间和诗人们提着标语筒，用白粉笔和黑炭水，在门窗边，在巨石上，在被轰炸过的墙壁上，顽强地写着，战斗着，敲响这时代的鼓声！

《讲话》的实践者：到群众中去

1982年，田间曾在《诗刊》组织的座谈会上回忆这场四十多年前的诗歌运动：“我在延安入党后就到前方去，一路上和邵子南等同志一起继续搞街头诗，那时很活跃一阵子……当时我们只知道为群众，对‘如何’我们也经常讨论，也有不同意见，但谁也说不服谁……后来毛主席‘讲话’发表了，大家一起学习，有的问题就比较清楚……当时忙于战争，学习也不深，收获深浅不一样。但大家都希望下去，到群众中去。”1942年，毛泽东同志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照亮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前进道路，也深深影响了田间的思想和创作。在《讲话》的号召下，田间到基层从事党委和群众工作，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去。

1943年，田间任孟平县委宣传部长，在一个临河的村子里，他结交了农民朋友——村干部老张。老张是一个贫农，又是一位民间艺人，在结伴开展工作的过程中，他常常编写简单顺口的民歌。他动员入伍的新战士，就写“我生在青春，希望入伍打先锋”，他跟着老乡劳动放羊就写“羊羔吃奶用头攻，羯羊强糊来讲话，山坡羊快长大，不久咱们就可吃胖啦”。总之一老张做什么就写什么，他写的就是他做的，他写下了就一定去做，通俗易懂，贴近生活，群众接受度高，传唱度也广。这给了田间很大的启发——“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我也有过这种想法，觉得革命的诗人应该是：自己写的自己就要做，这样创作和行动才能一致，诗歌才能有生活实感。”(《下乡二题》)在这条实践的河岸上，在农民老张的身上，田间找到了创作源泉，他决意用诗歌拥抱具体的人，用具体的行动描写人，从人民的斗争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。

于是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成了田间诗歌的主角，他们被旧社会遮羞的面容逐渐清晰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姓名。以一位普通站岗者命名的诗歌《王良》，写下了王良在敌人的围攻下，决不屈服的胸膛；劳动英雄刘万成种的庄稼，苗根如大杯口粗，苗叶如宽带，田间写下《贺刘万成》，夸他的 地像红毡，玉蜀黍似老虎。这一时期的田间更加注重诗歌的流畅性和口语化，他充分吸收了民歌的特点，写下了长诗《戎冠秀》，讲述了农村妇女戎冠秀反抗旧社会、带领群众翻身解放的故事。另一首长诗《赶车传》则塑造了一位贫农英雄石不烂，他跟随共产党反抗地主压迫，赶着时代的列车，一直奔向共产主义。

从上海滩到晋察冀，从武昌旅馆的孤影到群众的“知心人”，从奔走呼号的热血青年到以人民为师的实践者，田间用坚决的行动回应着时代的召唤，用不懈的创作践行着对人民的初心。正如他在《给战斗者》的《小引》中所写的那样：“我们不要只记得过去，更要紧的是前进，和人民、和生活一同前进。并努力作新时代的主人！”这呐喊，至今仍在历史的山谷回响，而填写时代答卷的笔，交到了我们手上。

(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公室助理研究员)